

书评
Book Review

日记中的生命存在与公私之间 ——论何启良著 《沈慕羽日记研究：生活篇》

Life Existence and the Public-Private Sphere in the Diary

—— On *The Study of Sim Mow Yu's Diaries: Living*

by Ho Khai Leong

许德发

(KHOR Teik Huat)

一、前言

在中国传统书写史中，“日记”由来已久，而且地位极为重要。追溯起来，一说早在西汉宣帝时，即有平民王世奉所书写的《狱中日记》，另一说则是指始于公元808年唐代李翱的《来南录》（陈左高2004：1），此后经宋元两代的发展，至明清时期蔚然大观。有清一代，由于教育较为普及、国民意识觉醒，各不同阶级者都开始记录所见所闻，致使日记数量大量增加，形式与内容亦日趋多样化。粗略统计，已知而未刊的日记就数以千计，尚有大量的日记保存于后人与收藏家手里，即使有些已收入图书馆

许德发 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中文程高级讲师、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

E-mail: kt942000@yahoo.com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19

库藏，未经编目整理的，也不在少数（桑兵2011：67-80）。晚近以来，大量“日记”的刊行更进一步丰富了研究的材料，对文史研究颇多推进（朱曦林2017）。日记作为记录个人经历的文献，涉及了记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记主生活时代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家庭宗族、岁时节日、社会风俗、礼仪服饰、艺术品鉴、宗教习俗等，皆会不同程度地在日记中呈现（朱曦林2017）。故此，日记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凡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思想学术与个人际遇皆载于其中，但也由于记主的地位、学养、旨趣、立场、撰著目的与记述风格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以致每一种日记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就成了日记需要解读的凭借。是以，在解读日记时，不仅要注意参酌同一时代、同一事件、相关人物的文献材料，还要将其记载放在更为广阔的时事背景中进行考量，在充分了解著者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利用、挖掘“日记文献”的价值（朱曦林2017）。

事实上，史学界对于将日记做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也一直存在着正反两面的意见。赞成者认为历史人物的日记多半会记载当事人对于事件的第一手记录，因此最接近历史事实的真相，尤其随着文化史研究取径的兴起，日记也可提供史学家探究小人物的心境、日常生活、人际交网；女性史研究者亦十分注重日记，盖大叙事的历史往往不见女性踪影，唯女性日记能勾描女性自身的生命历程（吕绍理2015）。反对者则以为即使是事件当事人，也会因种种私人因素而未必将所见所闻在日记中全盘供出，或者即使有所记载，也多少带着当事人的偏见而扭曲了事实（吕绍理2015）。用杨天石评析蒋介石日记时所说的，“有相当真实性，但真实不代表正确和全面”最能概括日记的特质（张港欣2017）。由此可见，在充分肯定日记的价值之时，我们也有必要理解其限制与可能的问题。故此，本文将尝试略微梳理日记的史料价值与其限制，并以此角度略析新近由何启良博士所撰述的《沈慕羽日记研究：生活篇》，一方面从中探视沈慕羽书写日记的意涵、意义及何启良的研究途径，另一方面也说明《沈慕羽日记》可能的限度与笔者的个人疑问，尤其是其日记中有关公私性质之间的问题。实质上，日记本与记主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何启良首先推出沈慕羽的生活日记研究，是有其特别意义的。

二、沈慕羽日记的价值、个人建构与何启良的匠心

2006年，随着《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史丹佛大学之公开，海内外学者争先前往阅览抄录，以《蒋介石日记》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及论文专著亦相继出现，中文史学界可谓掀起了一股“日记热”（连玲玲2014：50）。但在马来西亚，尽管有不少回忆录，日记却阙如，因此随着《沈慕羽日记》之即将出版，尤其是记主罕见的长时段记叙、言不烦地纪录每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这本身就是值得探究的另一个问题了。实际上，这种逐日、长时期书写的日记，更是一项珍贵的日常生活纪录与为时代所留下的证言。¹何启良誉之为“百年一遇者”（何启良2019：v），实不为过。本文将先窥探沈慕羽书写日记的意涵以及何启良的研究途径。

（一）“百年一遇”的沈氏日记

沈慕羽是于1957年四十五岁那年去美国考察时开始写日记，此后数十年，他从一位小学教员逐步成为马来西亚华人史上其中一位最重要的人物，在教育、华团、政治诸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而这一习惯仍始终不辍。随着他成为教总主席及教总对华文教育斗争无役不与之下，其声名愈益显赫，影响愈益扩大，人际与交游圈子愈益广泛，日记内容自然也愈见丰富、庞杂，已经不仅仅是记录他个人的生活经历，而是在记录整个华人社会甚至马来西亚的当代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及之后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无论是教总的事迹、华文教育的几次风波……在沈慕羽的日记中应当都有所记载，而他对这些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正如何启良所言，“日记里有人生感悟、生活点滴、病隙碎笔、人物交游、时局观察、史海钩沉、奇闻异事、风俗流言。它是沈慕羽的心态史、生活史、交游史、思想史、家族史，也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史、教育史，更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地方风俗史和社会史”（何启良2019：ii）。换言之，在沈慕羽日记中，可看到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教育史、华团史、政治史演变的轨迹。就这个意义来说，沈慕羽日记可堪称为一部内容广泛的马来西亚华人信史。何启良的研究正是藉沈慕羽日记及其史料的特性，恰好得以填补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

空白。沈慕羽日记在某种程度解决了华社研究资料缺乏之难题。

据何启良所言，“他（沈慕羽）从1957年至2009年52年间的日记，总数约6百50万字，已经可以称为世界最长的日记之一。在马来西亚，前无古人，相信也是广陵散绝”（何启良2019：iv）。这是有道理的。尽管以中国日记来说，近代中国著名的蒋介石日记与胡适日记也都超过五十年，²但沈慕羽日记仍然可堪比他们。以字数计，胡适早年就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是现代作家之中日记写得最多最勤也最连贯（中间只有少量的缺失）的，总计也只约在350万字左右（桑逢康2012：2）。³如上所述，如此坚持不懈的写日记本身已经值得我们注意，因写日记花时浩大，非持之以恒者不能。胡适在其《胡适日记》曾说：“下午，专补作日记。日记实在费时不少。古往今来日记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真不容易。怪不得作日记能持久的人真少。”（见《胡适日记》民国十年五月四日）。实际上，保存日记已是一种负担，除了担心被偷看、天灾时无法抢救，紧急时还必须销毁……因此能保留下来的日记，特别是较长期者，史料价值益显珍贵（许雪姬2015：4）。沈慕羽的日记其中1960年本即因茅草行动被便衣警探带走而遗失（何启良2019：464）。他晚年即使在病榻上也坚持写日记，写日记已经是一种坚持（何启良2019：15）。2005年沈慕羽生前曾公开其日记，自语其日记是“文化界罕见的伟大文物”（何启良2019：30），可见其掩不住的自意，但客观而言，记主此言不虚。

（二）自我重构与研究之取向

有关日记的研究取向，黄克武曾很好的归纳出四种，首先最多人采用的是传记取向，使读者对日记主公私领域的了解更为丰富。其次是事件取向，这在探讨日记主角长期心路历程时较常出现。第三是记忆取向，展现从个人记忆进展到社会事件的多方竞逐过程。最后是知识界人际网络取向，如胡适及研究系联系、章门弟子与北大教授之间的竞争关系，都有助重绘与丰富新文化运动学术图谱内容（任育德2016：158）。以此而论，何启良此书基本以第一种研究取向为主，并以第二种取向相兼，即以记主

沈慕羽个人生平为中心，藉其日记资料加以阐释记主各方面长期的心态与生活变化。实际上，日记和自传（包括回忆录）都是书写自我的文体，不过性质有相当大的差异：如果说自传是“现在的我”对“过去的我”的重构与诠释，那么日记可以说是为了担心“将来的我”遗忘“现在的我”而预留的纪录。尽管两者都是建构自我（selfhood）的行动，自传通常有特定的意图及明确的主题，是传主自我评价的结果，因此与主题无关的“旁枝末节”往往被删除；但日记乃记录当下的观察，一般而言没有特定主题，比较庞杂，这使我们有机会听到宏观论述之外的“噪声”（连玲玲2014：87）。随着日记研究的深入，日记对记主一生的自我重构之意涵逐步得到发掘。王汎森研究明末清初士人社群时，特别强调日记在个人修身实践上的作用，张淑雅则从《蒋介石日记》注意到“日记书写”对于政治人物个性塑造的重要性（连玲玲2014：51）。彭勃〈道咸同三朝理学家日记互批研究〉一文以李棠阶、曾国藩和倭仁日记中保留的零星线索为根据，还原道咸同时期日记互批复兴的整体图景，并指出传观日记、互相批阅的修行方式因倭仁达到的顶峰。倭仁的日记在当时被广泛传钞，成为当时理学复兴的标志，郭嵩焘等人都深受其影响。但倭仁非人人可学，曾国藩学习倭仁，按照理学家自修的标准记载了161天日记，却几乎每天都陷入极端激烈的内在斗争之中。他清楚自己的弱点，不断立志自新，一次次发誓要谨言、早起、夜不出门……却又总在第二天违犯。当期望无法达成时，曾国藩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自我厌弃并怀疑日记的意义，于是罢写修身日记（彭勃2019：181-192；尧育飞2018）。换言之，传统上日记有修身自省之用，日记能带给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将私人之生命历程透过自己特殊笔法活泼地叙述出来。

既然日记攸关自我重构或建构，那么值得我们追问的是，沈慕羽坚持写日记背后动力是什么？是怎样的一种书写姿态呢？实际上，上面提及沈认为其日记是“文化界罕见的伟大文物”，已可窥视到他是孜孜于经营其日记的，是每天例行性的工作，此中应有更深沉的缘由。何启良有专篇讨论其日记书写的动机，认为他“可谓珍惜日记如生命”（2019：15）。何启良也寻证各种文献，如从易君左日记与游记寻思沈慕羽所受的影响

(2019: 17)。沈慕羽于曾1969年1月1日的《日记》中说,“(日记)是我的生活记录,也是我的血泪史、奋斗史,将来可能是我的回忆录”(引自何启良2019: iii)。何启良在《沈慕羽日记研究》中指出,沈慕羽写日记的动机是为了帮助记忆(2019: 23)、头脑有劳动、不易痴呆(2019: 17)。不仅于此,何启良在论及沈慕羽对资料搜集之注重时,指出其写日记的动力“是他深沉而强烈的存在感”,“唯有留下文字、留下物件”,“写给自己让自己证明自己存在”,进而论断沈慕羽具有一种历史感,“一种人类历史和个人命运交融在一起的神圣感觉”(2019: 181)。这里可见何启良的学人情怀,匠心独运,以自身一颗心灵来体会记主的苦心孤诣。然而,以上分析似乎仍窥探不出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物是如何炼成的。从何启良的研究中,沈在日记中似乎自省较少,这与日记的书写传统有些差池。⁴作为生活篇,读者当会追问,这之间的原因为何?沈的日记形态是不是多有记事,少于内省或多于抒发?

在本质上,日记除了是一种日常活动的实践,但它同时与国家或时代的叙述相连接。日记所记载面向的多样性、驳杂性以及详尽的日常物质文化书写中,可超越下层民众历史的碎裂化,而可联系记主对国家、时代的整体思考,沈慕羽日记尤其如此。更具体的说,日记史料的重要性在于其“细节”,研究者反而不感其“琐碎”为恶,正如学者对于吴新荣日记的所谓“琐事”的看法那样,即认为“日记当然是记录每天生活的琐事,可是这些琐事连贯了三十几年之后,就成为珍贵的‘史料’”。换句话说,在文化史或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上,这些各式各样琐碎的细节,不仅必要,甚至可补充历史往往过度偏重“个人大事”叙事倾向的不足(陈文松2017: 8)。而这些“生活的琐事”,正是研究日常生活史的宝藏(陈文松2017: 4)。何启良非常珍视日记的细节,在序言中提及,他在编写时也特别注重日记内文,“大量的摘录”,以照顾沈慕羽日记述事的完整性及他背后的精神(2019: v)。何启良首先推出《生活篇》似有其特殊蕴含,意在从生活中看出记主的生命基调。沈慕羽日记巨细靡遗地记录其生活的动态与生活作息的律动,何启良从五十余年650万字浩荡的资料中筛选出足以凸显记主日常生活的众多关键词,可见其用力之深。他甚至统计

了沈慕羽日记中有关病情的文字共1万8千字之多（2019：77）、胃病的记录有7、8千字（2019：81）。日记主人如何在有限的日记空间中取舍一天二十四时的生活内容？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得要将每一位日记主的日记全部看完，也就是要跟着日记主人过他的一生，从中掌握日记主书写日记的目的、习性与特征，才有可能理解日记主习惯偏向什么类型的记事或关切什么样态的事物，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在不同时空处境下的习性和关切也会有所变化（吕绍理2015），因此要综览全局，才能掌握其中的变与常。与此同时，日记必须配合其他资料，它无法单独存在，除了辅以其他史料、档案等将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琐事“脉络化”之外，还须以俯瞰全局的视野，尽量趋近日常生活的样貌，掌握与大时代的相互影响（陈文松2017：10）。何启良在参阅庞大的各种资料去考证沈慕羽的人生观、生活态度，对于年老、生日、读书、写作、演讲、饮食习惯、理发、看病、娱乐、失眠、做梦、买股、招保（共四十三则）及扣留营岁月（十七则）等等生活面向上，呈现出不同以往刻板印象中的记主形象。何启良通过解读记主的生活琐事，细致地分析至沈慕羽所吃的食物（素食）、所使用的交通工具（脚车）、所出席的宴会等等细节，同时将之延伸至时代之演进，这让读者更容易想象沈慕羽生活中的个人与时代空间，进而了解其思想与行动。何启良此书可说已揭示了沈慕羽的公私生活与内心世界，也使我们得以观察到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面向。

（三）著者的同情之理解

此处我们亦有必要追问何启良是从什么角度探析沈慕羽？何启良在〈总序〉中说，“沈慕羽文格和人格的统一，莫过于日记。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可能还会有掩饰和虚伪的成分。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更能反映灵魂深处的暗点与亮点。”（2019：iv）这里已说明，基本上何启良是站在信任的角度来剖析沈慕羽日记。在他著名的〈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一文中曾见劲道的给予沈慕羽一个重要的历史论定：沈慕羽是人格典范者，他以其道德人格之典范防止政治与文化人格的失范（何启良1997：

50)。对何启良而言，沈慕羽对他一生事业的执着，不退缩、不投机、不气馁，真得可称为一位“行万里路”的大丈夫。他能自拔于现实挫折之外犹不改其志，处逆境之中犹不变其高旷节操（1997：51）。他将沈慕羽与林连玉相比较，指出若后者的一生可以“怒奋空拳搏虎头”概括，代表“虽千万人吾往矣”、走在前线的勇者，那么我们必须用“华教尚未平等，同志仍须努力”来诠释沈慕羽的基本生命形态，他身上所彰显的价值便是不断求新、力争上游、永不言休得积极者（1997：55）。由此可见，他对沈慕羽的高度评价，而由此也可知何启良的日记研究角度与旨趣，即对记主的崇慕是其书写基调。面对沈慕羽日记，他在后记中自言是以一种庄重的精神状态揣摩沈慕羽，比写学术论文更认真与谨慎（2019：565）。从生活篇的序言，也可见端倪，何启良站在同情的角度，甚至是一种与记主精神相契合的境况下立论的。何启良在总序中也说，“面对那一页页记录着马来西亚华族沉重脚印的史册，我不敢有半点轻薄之意”（2019：iv）。不难理解，他因此认为“日记叙事、论人，伏脉千里，或隐于不言，或细入无间，必须梳理才能清楚意会。我希望通过自己的阅读，加以阐述、综合和辨析，寻找脉络，透过一层同情的理解，介绍给读者这部大书丰厚的内容。”（2019：v）他尝以孔孟之道、顾炎武等儒士来揣摩沈慕羽的心境与人格追求。有一则分析沈慕羽梦国父最见刻度，文中提及记主梦见孙中山“对于我为华文而争取之事，表示钦佩”，这段最可洞察沈慕羽内心最得意的事，犹如孔子梦周一样（2019：220）。实际上，往往在阅读了所引的沈慕羽日记片段、再看何启良的阐释之时，似乎隐隐然感受到那也是何启良的情怀与精神向往。

基本上，此书夹叙夹议，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沈慕羽为我们揭示了一位平凡中却有着巍巍然形象的人格。这让人不由得想起颜渊对老师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第九》）。这应该是何启良此书最重要的意义。陈寅恪于1930年指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

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彭华2010：32-58）。显然的，何启良熟悉与秉持陈寅恪这一“同情之了解”，或陈寅恪自己称之为的“了解之同情”之治史态度，认为这是“真了解”古人（沈慕羽）思想与心态的不二法门，因此我们得以读见在历史洪流当中个人微小却鲜活跳动的内心动荡与思考。

三、日记的限度与沈慕羽日记的若干可思考之问题

前面已说过，日记有其先天性的限度，主要在于其记述上之简单、敏感性（许雪姬2015：9），⁵ 它尽管真实但未必正确和全面，比如鲁迅日记就特别注重于记录天气、生病、书单、稿费、朋友来访等，这难免使日记所透露的事实可能流于片面。日记研究的盲点还包括记主写什么、不写什么、记主是否有所顾虑下书写等等（许雪姬2015：21），事实上，历史既已逝去自无法完全还原，即使记主如实的记述，所能呈现的也只限于个人所见所闻，更遑论每个人都有主观意志，对同一事件亦有个别看法，因此第一手史料之真也只能以相对之真视之，沈慕羽每一天的日记皆有标题似乎已表明其选择性。故此，由于日记有其限制，对日记的解读显得非常重要，以下尝试指出沈氏日记的若干可能问题，以资思考。

（一）介乎私密与公共之间

其中一个有关日记限度且引起争论的是其私密与公共性，这与记主的记事动机有关。罗以民从史料价值的角度将日记画分成写给自己看的、写给别人看的、既写给自己又留给别人看的、完全伪造的、真假参半的、特定时代的违心日记和伪日记等六种（引自桑兵2011）。当记主知道必须公开，其记录的动机就可能已经不一样了。一般来说，写日记是将实事记录下来，较少回头去增添、删削，即使有，用笔迹、墨色浓淡也可区别出来（许雪姬2015）。除了少数是写给“他者”看的之外，大多是写给自己看的，因此多未被修正润饰，具有原始性、私密性的特征（朱曦林2017）。

吴钦根〈日记作为一种著述方式——论谭献〈复堂日记〉的编选、删改与文本重塑〉一文利用首度披露的谭献日记稿本，在对比刻本的基础上，发现谭献将日记作为一种著述方式。在刊行刻本前，谭献对原始稿本做了大幅度的文本重塑工作。经由修改，谭献温柔敦厚的学者形象得以成功构建，而谭献日记内容也由此从私人化的记录彻底转变为公共性的知识（引自尧育飞2018）。以此而论，沈慕羽是属于哪一类呢？显然，他曾非常期待可以出版，如沈墨义所述，“先父生前希望出版日记”（沈墨义2019：vii），他甚至已经事先写了〈沈慕羽日记出版感言〉。据1986年10月17日日记载，他亲自在教总常务会议中建议把“沈慕羽大专奖励金”改为沈慕羽出版基金，作为包括出版其日记之用（何启良2019：23）。2000年，他还催促教总“对其日记之出版工作应有严密组织，通盘策划如何推展业务”（何启良2019：27）。2001年，教总已拟出版《沈慕羽日记》第一集，由李亚敖编辑，但此一计划因种种原因而搁置（何启良2019：16）。他甚至于对教总拖延出版“感到不满”，姚丽芳回复曰，学者的意见是不能摘录，日记的价值在于存真，不可造作（何启良2019：28）。据李亚遨的说法，他在沈慕羽临终前去探视时，沈氏仍对日记无法出版耿耿于怀（2011）。

循上而言，沈慕羽对日记的公开与出版已到念兹在兹的地步，因此我们似乎可断言，沈慕羽的日记至少分成前后两个阶段来看。前一个阶段或可言之为写给自己看的、私密的，那可能是一个私下的自我；后一阶段恐怕是写给别人看的，已属公共性了，可能更符合其公共形象，但这一公共性却极可能造成日记私密性的大量减弱。何启良就指出，他一开始是希望作为老来写回忆录的资料，但日子一久就有让人知晓的念头，将之作为一种创作与史料（何启良2019：23）。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问，沈慕羽有“公开传世”念头前后的日记有何区别？自有了公开的念头之后，其日记是否是自我价值之宣示，还是为了自我展演？有趣的是，2005年3月8日沈慕羽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其70本日记，当日日记题目即为“展示我的日记”（何启良2019：25）。连玲玲曾处理了日记出版的展示意义，其书写与流通如何影响个人的身份社会建构（2014：49-93）。沈慕羽即已准备出版

日记，这表明了其日记已经不完全是体现个人的自我建构，而是将自我与社会相连接，包括展现自我在社会中的角色等问题（曾士荣2013：17），而日记也将受到读者与外界的检视。何启良在研究中尝试解释此一问题，并为我们揭示了日记是作为沈慕羽自我存在与历史感之证成，而且指出，晚年沈慕羽开始意识到日记的珍贵，作为华社史料可以出版，而剪报的收集或许可以增加日记的可读性（2019：174）。一般人均会认定日记乃记录个人私密经历与心情之物，但当他的日记是为了他人观看而写时，未必是私密真情的忠实告白，日记中极可能反映从私到公领域的界线游移，使其日记从个人生命记录转变为公领域的叙事，日记的意义自也有所改变显然。沈慕羽晚年日记转而注重剪报与资料保存就是一种公私界限之转移，这已稍微揭示了其日记前后期的差别，但似乎仍未说明其中是否对日记的写作——私领域记述——有实质转变？必须立即客观的指出，从日记研究角度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日记写作如有流传或公开打算，记录居心亦值得怀疑。因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此一问题呢？一些人甚至认为，一些名人日记在作者生前即行公开，不免失之矫饰，甚至公开暴露自己种种（有如今日的脸书）恐为伪作，因此日记所记载的内容，就是历史吗？（吕绍理2015）鲁迅就曾说道：“《越缙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二是许多墨涂，……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2005：24）。借用鲁迅批评胡适的日记是“做日记”，沈慕羽后期是如此吗？这似乎仍值得研究者探析。

（二）日记中的失记与所记之间

与上述相关，从日记的书写者的内在心态来看，正如俄国史家巴爱琳（Irina Paperno）所指出地，日记既是时空脉络下的历史行动，也是再现这个脉络的文本。她提醒读者，日记和其他文类一样，所有的观察与记载都经过中介（mediated）的过程，因此不应该被视为作者的日常/私密

生活仓库，而应视之为作者有意识地创造私密性的场域，并呼吁把日记放回历史脉络，从书写的生产及流通方式来研究、理解日记（连玲玲2014：51）。这又关系到史料生产的权力关系，例如这些日记史料是在何种情境下生产出来的？（连玲玲2006：281）我们或许也必须将沈慕羽日记视为一种有意识的创造，即他是在什么心境、心情下写日记，尤其是盛名或晚年之后？犹如上述，沈慕羽具有自我完成与建构的企图，“日记是他的血泪史、奋斗史……”，这自然不是有如理学家当着日课那样，但他似有一种自我荣光的心情。如前所述，日记离不开生活，也离不开记叙身边琐事，有些日记对于公事反而疏于记述，如清朝官宦的日记中有不乏不厌其烦地记录其各种隐疾的事体，这说明这类人多受类似的病患困扰，以及这些问题是他们经常要面对的，不过并不能依此推论他们在心中，私事的重要性在公事之上。因为不记的原因有许多种，或许是因为已经习以为常，故不需记载；或是公私分明；或是迫于时势、碍于情面等都有可能（桑兵2011）。杨天石教授指蒋介石“没意作假，有意不记”，但在蒋介石日记里，连跟老婆打架等私事也记载（见张港欣2017）。然而，此卷既为生活篇，可是沈慕羽似乎没有这类私生活的记录，如日记主与夫人之间的情感、婚姻以及家庭、个人欲望是否有过转折或挣扎？显然的，《沈慕羽日记》偶有“失记”之事，这在《沈慕羽日记》中意味着什么呢？何启良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如他分析沈慕羽对寿庆的不满而指出，“但是教总这次筹备工作有差失，反应不佳，他甚为失望。日记记述不多，可能心情不好的缘故。”（2019：9）⁶（这似乎说明沈非常注重“被敬重”。）在讨论脚车时，何启良注意到沈慕羽日记刻意记录了骑脚踏车的交通方式，指出了生活日记的有所选择与偏重（2019：37）。对最后的生日，“……当日的日记则是暮年记述生日最简短的一则，看来无论是行笔心情或书写内容，都已经进入返朴归真的境界了”（何启良2019：12）。

研究美国中西部妇女日记的历史学家韩莉莎（Elizabeth Hampsten）指出，有时日记中的沈默比话语更重要，她建议读者要以“创发性的耐心”来诠释日记主所说的和没说的（引自连玲玲2014：61）。沈慕羽日记有选择性吗？显然有，这可从其每日皆有题目可知。有什么没写呢？这似乎仍

是可以探究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用梵文而不用德文记账，就是为了不让别人明白。简言之，无论怎样直面自我，严酷解剖自身的人，也都不会在日记中记录自己最不想人知道的思想与行为。正如虔诚的基督信徒也未必会在上帝面前毫无保留、毫无遗漏地忏悔自己的罪恶一样，多少总会有所取舍，不可能毫无遮掩，全盘托出。世上从来没有事无巨细大小、不管有无价值、不分美丑善恶，一概全录的日记（桑逢康2012：1）。日记对认识、判断、评价一个人有重要的价值，但日记同文章一样属于“言论”的范畴，我们对任何人都要听其言观其行，并且主要是看他究竟做了些什么，而不是看他说了什么，或者记了些什么。所以必须将日记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与社会上发生的其他种种事实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考察，从而判断日记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谬误的（桑逢康2012：1-2）。我们同时发现，在沈慕羽日记中，他多尝追记之前的事，但老人记忆力稍差，其在日记中偶有回忆相互矛盾之处，如对于《古城月报》之创办（何启良2019：120-121）。在一定的心态下，回忆会转成诠释或所难免，但或许还是无意为之的可能性更大。

四、余论

胡悦晗及谢永栋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2010）提及“眼光向上”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方向（174-182），蒋竹山借此指出，其相较于过去日常生活史集中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目前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多集中于从社会、政治、文化等公共层面考察知识分子，较少涉及到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领域。我们若能从知识分子的日记、文集、回忆录等材料中描绘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场景，或许更能做到对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客观描述，也能够借助心态史研究方法，深入社会观念与知识分子的内心层面，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剧变是如何渗入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对其心态及观念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又如何改变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进而重新探讨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动态关系（蒋竹山2011）。显然的，何著《沈慕羽日记研究：生活篇》大体以传记与记主心路历程为研究取向，为

我们勾画与重构了一位马华公共知识分子、重要领导人的内在心灵图像。何启良以同情理解之研究途径，运用其历史想象力窥测了研究对象的主观感受，故此我们得以观见沈慕羽在生活上之自持、积极，他有其经济与欠债的忧患、被索字与招不到保时的牢骚、宴会时的不耐，也有自己对生命感叹、对老之将至的喟叹，更有作为一位人父的哀荣，亦有自己私下的沾沾自喜。我们知道何启良接下来也将探析沈慕羽日记中的思想文化观念、交游及政治教育等层面，期待这将进一步揭示社会剧变以及此书所揭橥的日常生活对其观念所产生之影响，甚至这些影响又如何与其社会事功相联系。

沈慕羽日记横跨半个世纪，其所记述的生活日常，常越出个人之领域，而与时代社会文化诸方面息息相连，几乎可以按年按日排纂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社会与心态的变化、思想流动等等问题，使得我们可以不局限于探讨他自身的言论与想法，而能从一个新的广度与纵深来探讨思想、文化史。比如何启良在此书中，从沈慕羽对有关理发的记述看到理发价格的变化，也记录了这个行业的设备变化（2019：55-57）。书中也谈素食，日记记录了素食餐业在人民生活里的演变（2019：115）。这些都是未来研究者可以继续探析的议题。简言之，从撰写〈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到今天的〈沈慕羽日记研究系列〉以及即将编辑出版的《沈慕羽日记》，在在的说明何启良尝试建立一个“阐释沈慕羽人格典范结构”之匠心。他平实的、谨慎的阐释了沈慕羽精神，其中没有“形而上”哲学意味，有的更多是平凡中映显着不平凡的一代人格。何启良说，沈慕羽“从自然中发挥出内在的朴素天性，不矫情，不虚伪。没有教条，只有自在；没有理论，只有实践”（2019：ix），诚哉斯言！诚如何启良所指出的，在日记中看不到沈慕羽做读书笔记与心得（2019：137），沈慕羽基本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读书人（119），比较起来，沈慕羽更重视读报，把之当着其精神粮食，把报纸当着最重要的知识来源，更像是因为社会活动人。“我躺在床上，把今天的报纸，看完一份有一份，给精神上无限的慰藉，我真陶醉在这样的凌晨美景中了。”（见何启良2019：126-127）沈慕羽在茅草行动中被扣留时，他一开始曾向审查他的警探表示愿意承认政府对

他的八项指控，并以放弃教总主席等职及健康理由换取当局对他“处境之同情”。何启良一一记出，并未特别加以为记主辩解，只注出此一事件之背景（包括进医院及未见到律师），让读者自忖（2019：492-493）。简言之，在何启良笔下，沈慕羽不再仅仅是华社所表面理解的华教公共斗士，同时他又具有足够丰富性的个人内在生活风景。

注释

- 1 马来西亚华社有没有其他日记书写的留存是另一值得追问的问题。沈慕羽自己提及其中老师吴体仁老师在1981年去世时，留下日记三十余本。（何启良2019：7）
- 2 蒋介石由28岁写到85岁，共写了57年日记，但当中有4年丢失了。胡适则自1910年开始写日记，直到1962年去世之前，前后逾50年。其实还有不少超过半世纪的日记，如《王伯祥日记》，记主是现当代出版人和文化学者，他从1924-1975年间写了140余册日记（陈左高1990）。
- 3 《胡适日记》现收入于《胡适全集》第27卷至34卷，共有8卷之多。
- 4 如上所提及的倭仁、曾国藩等理学家例子。学者亦就《蒋介石日记》探析记主的“省克记”，对蒋氏的省克生活作一描述与分析，并进而思考其历史意义（黄克武2012：45-68）。
- 5 正基于此，记主去世五十年后或家属代表授权才能出版。（见许雪姬2015：10）
- 6 这不禁让人想起胡适，他在流放美国期间，日记简单，也因心情不好。

参考文献

- 陈文松2017。〈一套日记库、一本“趣味帐”领风骚〉。《汉学研究通讯》，36：3（总143期）。
- 陈左高1990。《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 陈左高2004。《历代日记丛谈》。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
- 何启良1997。〈大马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教总，19-55。
- 何启良2019。《沈慕羽日记研究：生活篇》。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
- 胡悦晗、谢永栋2010。〈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史林》，第5期，174-182。
- 黄克武2012。〈修身与治国——蒋介石的省克生活〉。《国史馆馆刊》，第三十四期（12月），45-68。

- 蒋竹山2011。〈人物、日记与日常生活史研究〉。“新文化史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ginseng/article.php?entryid=616935>，4月14日。
- 李亚邀2011。〈与沈慕羽先生的最后一面——写于先生逝世二周年前夕〉。《东方日报·东方文荟》，1月23日。
- 连玲玲2006。〈典范抑或危机？“日常生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应用及其问题〉。《新史学》17卷4期，12月，255-282。
- 连玲玲2014。〈从自我书写到公众展演：艾佩琪（Peggy Abkhazi）的战时日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6期，12月，49-93。
- 鲁迅2005。〈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 吕绍理2015。〈日记与历史〉。“历史学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02/日记与历史.html>，2月13日。
- 彭勃2019。〈道咸同三朝理学家日记互批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月，181-192。
- 彭华2010。〈“同情的理解”略说——以陈寅恪、贺麟为考察中心〉。《儒藏论坛》第五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32-58。
- 任育德2016。〈“蒋介石日记与民国史研究的回顾”学术讨论会纪要〉。《国史研究通讯》，第10期，6月1日。
- 桑兵2011。〈日记内外的历史——作为史料的日记解读〉。吕芳上主编《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台北：世界大同出版，67-80。
- 桑逢康2012。〈现代作家日记研究——以胡适、鲁迅、郁达夫为例〉。《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37卷（总第181期），1-13。
- 沈墨义2019。〈《生活篇》序·父亲的生活点滴〉，于何啓良《沈慕羽日记研究：生活篇》。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
- 许雪姬2015。〈日记书写与历史记忆：以台湾出土的日记为例〉。辅仁大学举办第五届世界史研习营“日记、书信与历史书写”，3月21日，1-24。
- 尧育飞2018。〈日记如何拓展近代文史研究〉。《中华读书报》，8月29日。
- 曾士荣2013。《近代心智与日常台湾——法律人黄继图日记中的私与共（1912-1955）》。新北市：稻乡出版社。
- 张港欣2017。〈杨天石：不看蒋介石日记是损失，只看蒋介石日记会受骗〉。刊于“灼见名家·灼见文化”，11月8日。
- 朱曦林2017。〈“日记”中的历史——兼谈日记的文献价值〉。《文化周刊》，8月9日。